

莉莉·巴特與《歡樂之家》 中的女性情誼¹

林 素 英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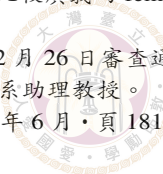
本文試圖將伊底絲·沃頓 1905 年出版的小說《歡樂之家》中的女主人翁莉莉·巴特歸類為「女性三十」的小說之列，並辯證在沃頓的刻畫下，莉莉·巴特成為一位被囚禁在既定的社會、經濟與慾力產物的固定狀態上，並且無力做出任何替換的熟齡女性。接著，文章試著分析對沃頓小說寫作背景有重大影響的一個因素：美國十九世紀所謂的女性同性社交文化的形成與演變，以及此一同性社交文化對《歡樂之家》文本中異性戀婚姻主軸與女性同性情誼副軸兩者的互動，所造成的一些深遠影響。接著，文章中針對女性同性情誼副軸詳加分析，論述焦點主要是放在莉莉·巴特與幾位親人：母親、姑媽、表姊，以及幾位女性友人：茱蒂·崔納、蓓塔·朵塞、歌蒂·法瑞琪與涅蒂·史陀瑟等人之間的關係上。分別就下列幾個子標題作詳細的文本分析：「母愛匱乏／區隔與個人化的不完全：莉莉·巴特的女性至親」，「善良母親與邪惡後母：莉莉·巴特的貴婦好友」，「新女性與勞工階層：莉莉·巴特可能的救贖」，以瞭解莉莉與周遭女性至親好

¹ 本文中有關女性情誼的論點是採其比較廣義的 female relationships 一義，其中包括了母女關係與女性友誼。

* 本文 95 年 12 月 29 日收件；96 年 2 月 26 日審查通過。

林素英，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中外文學·第 36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頁 181-220。



友之間所形成的女性情誼，以及莉莉因欠缺充足的母愛，而不斷地在其女性至親好友中，努力追尋女性認同與母親替代者的過程。本文最後的結論為：莉莉身為製造她的文明的一個產物，因此，早已被禁錮在一些既定的社會、經濟與慾力產物的固定狀態上，並且無力做出任何更換，死亡似乎成為她唯一的選擇。

關鍵詞：女性情誼，女性同性社交文化，女性文化，浪漫情誼，客體關係理論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Lily Bart and Female Relationships in *The House of Mirth*

Su-ying Lin *

Abstract

This essay tries to delineate Wharton's *The House of Mirth* as a "novel of the woman of thirty" and maintain that its female protagonist Lily Bart has been portrayed as one who is locked into fixed positions which are social, economic and products of the libido. Thus, she is incapable of making any change concerning her destined fate. Then, the essay attempts to illustrate one important factor having some bearing on Wharton's writings: the female homosocial culture i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merica, and to see how this culture affec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eterosexual marriage plot and the homosocial female subplot of the novel. Due to the fact that critical essays concerning the female relationships—mother-daughter relations, female same-sex relations—have been relatively few,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female circle" around Lily Bart and makes a detailed textual analysis of her female relatives as well as friends.

Keywords: female relationships, female homosocial culture, women's culture, romantic friendship, object-relations theor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修瓦特 (Elaine Showalter) 曾將沃頓的《歡樂之家》(*The House of Mirth*) 歸類為美國二十世紀初期開始興起的「描繪女人三十的小說」之列，因為書中女主人翁莉莉·巴特 (Lily Bart) 在小說一開始就已經是個年滿二十九歲，進入婚姻市場整整十一年之久的熟齡女性，而小說結尾她因服安眠藥過量而致死時則已年過三十了 (1985: 133)。有別於十八、十九世紀英美小說普遍圍繞著年輕女子遇到異性追求或誘惑，徘徊於婚姻十字路口等情節發展，「女性三十」小說試圖探討女性成長／熟之後所面臨到的一些問題。而該類小說也將重心放在適合三十歲左右的女主人翁的相關情節如何鋪陳、轉折與結尾，以及探討她是否得以在小說中產生轉變等問題之上。沃頓刻意選擇「女性三十」這個關卡作為題材，其中不無實驗與挑戰的意味。按女性年過三十在佛洛伊德眼中已經是定型而無法改變的了，² 他在「論女性」(“Femininity”) 一文中就曾表示過，相較於男性三十歲時「仍然顯得朝氣蓬勃與尚未定型，並且總可以在經過詳細評估之後，充分利用他眼前所有的良機而有所作為」。女性一到三十歲，「就令人吃驚地變成心理僵硬與一成不變，她的慾力 (libido) 已經固著在既定的狀態上，並且顯得無法更換為其他狀態」(22: 112-14)。《歡樂之家》中的莉莉·巴特，在伊底絲·沃頓的呈現下，正是如此一位被囚禁於既定的社會、經濟與慾力產物的固定狀態上，並且無力做出任何更換的熟齡女性。

誠然不錯，年近三十的莉莉·巴特與其他十八、九世紀文本中的年輕女性一樣，都面臨到所謂的「婚姻創痛」(marriage

² 大多數評論家咸認為沃頓本人對於小說人物性格的塑造，其實是受到達爾文決定論而非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換言之，沃頓基本上是認同達爾文主義所持的看法，即人類在面對外在環境所加諸在他身上的種種壓力時，本質上是無法對抗的。不過，在此我同意修瓦特的看法，我認為沃頓在《歡樂之家》中反而是比較傾向於佛洛伊德對於女性的 identity formation 觀點。

trauma)³——她必須及早在她所處的上流社會中，從少數幾個人選裡挑出一位終身伴侶，以便解決她長久以來所處的經濟困境與仰人鼻息的無奈現狀。莉莉的現狀，包括她那富裕而嚴峻的姑媽潘妮斯頓夫人（Mrs Peniston）雖偶爾贈送她昂貴衣物與零用金，但只提供她差堪維持上流社會衣食無缺的物質生活，以及她經由幫助幾位已婚的貴婦好友如茱蒂·崔納（Judy Trenor）與蓓塔·朵塞（Bertha Dorset）等人，處理文書或是透過陪伴彼等打牌與旅遊等雜務，以便換取她最鍾愛的奢華享樂。但是，莉莉·巴特這位修瓦特眼中「紐約最後一位淑女」（134），同時也是歐欽寇司（Louis Auchincloss）評定一個已消逝年代的「孤獨寂寞」的倖存者（36），最終卻在遍尋不著婚姻伴侶、喪失姑母遺產繼承權，再加上淑女聲名因為與已婚的葛司·崔納（Gus Trenor）有金錢糾葛而蒙塵，淪落到在污穢的廉價租賃公寓裡服藥過量而亡，結束她三十出頭的短暫生命。

然而，作為小說人物，莉莉·巴特這位「美國文學作品中一個成功範例」（Irving Howe 125）的際遇，實不能以其他文本中年輕女性所遭遇的「婚姻創痛」一言以蔽之。她的獨特與非凡，實如麗朵夫（Joan Lidoff）所形容的一樣，已經「超越了批評定義的極限，也超越了伊底絲·沃頓敘事結構的極限」（519）。換句話說，《歡樂之家》中莉莉·巴特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同時也是沃頓在文本中所亟需妥善處理的議題，固然是如何藉由嫁入豪門來解決莉莉的經濟困境。同時，乍看之下，屬於異性戀範疇的婚姻問題（heterosexual marriage plot），似乎應該是沃頓小說

³ 「婚姻創痛」（marriage trauma）一詞是由維琴尼亞·席樂伶伯絲（Virginia L. Schiller-Chambers）所提出，她認為英美十八、九世紀的適婚年齡的女性，因為受限於婚姻幾乎就是她們唯一抉擇的事實，必須儘早選擇良木而棲。再加上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離婚對女性而言又近乎不可能，因此，絕大多數年輕女性都會因為必須費心尋覓一個最佳伴侶而持續陷入焦慮、恐懼與懷疑的情緒中，這便是她所說的「婚姻創痛」。

中故事發展的主軸。⁴ 然而，細心的讀者經過解讀分析後不難發現，文本中其實還存有另外一條由環繞在莉莉周遭的女性友人所形構而成的同性情誼副軸（homosocial female sub-plot）。這條副軸的重要性不僅不低於異性戀婚姻主軸，甚且還有可能超過它。令人好奇的是，《歡樂之家》文本中的這條女性同性情誼副軸，卻只有極少數的評論家——如修瓦特與顧德曼（Susan Goodman）等——為文討論過。⁵ 有關這條副軸的討論如此稀少，以致於費特麗（Judith Fetterley）曾在文中強調，《歡樂之家》文本裡有關「女性之間相互敵對的模式」的確值得我們進一步去研究（203），這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所在。

根據修瓦特的看法，《歡樂之家》作為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

⁴ Joan Lidoff 曾在“Another Sleeping Beauty: Narcissism in *The House of Mirth*”（1980）一文中表示，很明顯地，沃頓並未在文本中創造出一個適合與莉莉·巴特結婚的男性角色（534）。Judith Fetterley 亦曾在其“‘The Temptation to be a Beautiful Object’”（1977）一文中作了類似的看法，她認為婚姻雖然是莉莉唯一的出路，但是，沃頓對其婚配對象的描述，卻是一概不脫令人嫌厭的主調：“Her description of the types of males available to Lily for marriage (Percy Gryce, George Dorset, Gus Trenor, Sim Rosedale) underscores its unpleasantness”（204）。

⁵ 近十年來對於《歡樂之家》的論述，大底不出下面幾個討論範圍：其一為探討沃頓文本中大篇幅使用的室內裝潢技巧與意象，以呈現出莉莉·巴特的個性，如 John Clubbe 的“Interiors and the Interior Life in Edith Wharton’s *The House of Mirth*”（1996）；或是解讀都市景觀與性別之間的關係，以及莉莉與她所處的消費社會之間的關係為何，如 Nancy von Rosk 的“Spectacular Homes and Pastoral Theaters”（2001）；其二為研究《歡樂之家》中複雜的意識型態裡，像莉莉般的女性如何自處，與她（們）努力追求與其內在生活相稱的外在環境的奮鬥過程，如 Benjamin Carson 的“‘That Doubled Vision’: Edith Wharton and *The House of Mirth*”（2003）；其三為嘗試瞭解小說家沃頓與她的讀者群之間的關係，亦即世紀之交的中產階級讀者，普遍存在的「向上閱讀」以獲取包括物質與知性層面提升的滿足，如 Amy Blair 的“Misreading *The House of Mirth*”（2004）；其四則強調沃頓深受拉瑪克（Lamarckian）而非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如 Sharon Kim 的“Lamarck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cendence in *The House of Mirth*”（2006）。上述幾種類型的最新研究，因為與本文所要探討的女性情誼並無直接相關之處，因此在正文中略而不談。

文本，實處於跨世紀前後兩個不同階段的美國女性小說的轉接點上。修瓦特所說的兩個女性小說的階段，分別為十九世紀以女性同性社交（homosocial）為主的文化與文學，即美國歷史學者史密斯羅森柏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所說的一個「純屬女性愛戀與儀典的世界」（1975: 8）；以及二十世紀現代主義以描繪異性戀戀情（heterosexual）為主的女性小說（Showalter 134）。沃頓小說中的女主人翁莉莉·巴特，正是如此一位身陷由兩種不同女性經驗所構成的世界的轉接點上的女性；這兩種女性經驗包括了以女性同性結盟與母女關係為主題的敘述，以及以男女兩性相處取代女性同性關係的描述。在進一步討論《歡樂之家》中主、副軸間的互動關係，與女性同性情誼副軸的重要性之前，本文將先述說一下美國十九世紀所謂的女性同性社交文化的形成與演變，俾利分析對沃頓小說寫作背景之影響。

《歡樂之家》與女性同性社交文化

不少學者都同意美國社會大約在 1870 年前後，性別角色與兩性關係發生了不少轉變。而美國女性值此歷史與社會變遷之際，她們彼此之間關係的變動也影響了同時期女性小說在內容與題材上的不同。美國內戰前的女性小說普遍被稱為「言情小說」或「家庭小說」，在題材上主要著重在稱揚女性彼此間的姊妹情誼與歌頌母親角色的神聖性，也就是女性學者所說的「女性文化」（“women’s culture”）。在 1870 年之後，女性文化備受社會攻擊，⁶ 女性小說家中有一小部份卻仍不改初衷，繼續頌揚女性文

⁶ 卡蘿·史密斯羅森柏格曾在“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omen’s History: A Symposium”一文中表示，美國大約在 1870 到 1880 年代時，由於社會變遷帶給女性較多的角色可供選擇，她們的母親輩與其他年長女性卻經常試圖阻止

化的特質，並視男性為破壞她們彼此之間田園般美好社群關係的罪魁禍首。惟有鑑於女性教育與社經地位的大幅提昇，另一部份女性作家則在小說中極力鼓吹「新女性」（“New Woman”）；她們筆下的新女性通常受過高等教育，稱得上是學有專精，其中有不少人選擇不結婚，並且大力倡導社會與經濟變革，甚至有不少女性還具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Smith-Rosenberg 1985: 245）。雖然大約在 1870 年前後，美國女性小說內容有較明顯的轉變，但基本上仍是以女性同性社交的描述為主。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誠如唐納文（Josephine Donovan）所形容，維多利亞時期這種「以女性與母權為中心的世界」，不論是著重於稱揚姊妹情誼與歌頌母職的神聖，或是強調「新女性」的描述，⁷ 實已到了其強弩之末（119）。在面對來自以男性科技發展為主與父權制度掌控的雙重壓力下，女性文化所側重的一些特質如姊妹情誼與母女關係的描述，也甚少成為二十世紀女性作家小說文本中的重點所在了。

根據史學家的觀察，在十九世紀「女性文化」的全盛時期裏，歐美各國的文化普遍都認可中、上層社會的白種女性彼此間存在著親密甚或是愛慾的關係。在泰勒（William R. Taylor）與拉許（Christopher Lasch）等學者首先提出存在於十九世紀美國文化中的「姊妹情誼」（sororial relations）現象後，史密斯羅森柏格緊接著便主張要以文化與社會學的角度，而非精神性學的立場來檢

她們作如此的期望。而到了 1890 年左右，則開始有不少男性不斷攻擊由女性間的彼此認同與團結意識所形成的同性情誼世界的正當性（59, 63）。

⁷ 根據史密斯羅森柏格的看法，作為一個社會現象，「新女性」大約在 1930 年左右便漸漸被男女兩性學者與社會大眾所否定了。不過，在 1890 到 1915 年間，也就是 Mary Wilkins Freeman 寫作的巔峰時期裡，倒還可見不少有關「新女性」的描繪。

視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情誼。⁸ 她認為美國由於內戰後家庭結構的變遷與性別角色分工愈趨嚴峻，不僅使得男女兩性之間的距離加大，形成壁壘分明所謂的「男性領域」與「女性領域」，更因為男女兩性各自成長於以同性社交為主的團體裡，婚姻適應不良的問題普遍存在。緣此之故，維多利亞時期的婚姻裏到處可見夫妻間「感情緊繃與距離疏遠」的現象（1985: 75）。在面臨到人生幾個重要歷程如懷孕、生產、育兒、停經等階段時，女性因此自然而然的會趨向母親與其他女性長輩，或是一起成長的女性朋友尋求精神上與情感上的協助與支持。這個純粹由女性同性所形成的支持網絡不僅伴隨大多數女性一生，同時也已經被約化為社會習俗與儀典的一部份了：

十九世紀的美國社會不僅不會限制親密的女性友誼，甚至還將它視為社交上可行的關係之一。它同時也是一個女人終其一生都可以持續保有的關係。誠然不錯，〔青少年間〕應該嚴加防範的不是同性交往，而是異性愛戀。相對於女性彼此之間可以擁有親密、情感流露與不設限的身體接觸，男女兩性之間就無法如此自由了。我們因此可以從少女間所處的這個充滿女性互相扶持、親

⁸ 史密斯羅森柏格 1975 年發表在 *Signs* 的論文「女性愛戀與儀典的世界：美國十九世紀的女性關係」，主要是根據她採樣自美國 1760 至 1880 年間的三十五個家庭成員的日記與書信分析所得（1985: 54）。她認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陸的性學專家如 Richard von Krafft-Ebing 與 Havelock Ellis 等人所側重的是他們具有「性偏差」（abnormal）與「性異常」（perverse）病患的個別病例研究，而佛洛伊德的 libidinal theory 也同樣的著眼於個別病患童年或青春創傷造成日後同性戀傾向的研究。史密斯羅森柏格認為這些研究女性同性關係的本質與根源（nature and origins）不僅取樣不足，甚至是時常植基於一些具有爭議性的資料，實在遠不及她所提出的具有文化與社會意含的假說（1985: 53, 268-69）。

密與儀典的世界裏，推斷出成熟女性自然會以誠信與愛戀來對待彼此了。（1985: 74）

此外，另一位女性主義學者費德曼（Lillian Faderman）也在其《超越男性之愛》（1981）一書中探討了一次大戰以前英美與西歐各國女性彼此之間的「浪漫情誼」（romantic friendship）。她表示雖然女伴男裝與其他僭越或侵犯男性權力與利益的作為普遍受到社會責難，女性彼此間的親密甚至充滿愛慾的感情卻廣被允許。⁹ 同時，費德曼也同意寇特（Nancy Cott）的看法，認為十九世紀的女性由於自幼被家庭與教會教養成要嚴守貞操，同時重視屬於女性所特有的高道德「心的特質」，因此對異性的性慾上基本而言是「無動於衷」的（passionlessness）（158-59）。而同時期美國的一些男性學者則有鑑於內戰折損了大量年輕適婚男性，使得未婚女性的人口數遠多於男性，因此極力鼓吹女性從同性朋友的交往上尋求慰藉，以彌補無法獲得婚姻伴侶的缺憾，並且從而讓女性在得到適當的情感宣洩後，更安於居家的現狀，社會安定的秩序也因此得以維持。¹⁰ 更由於他們堅信女性是「無慾」的——對丈夫如此，對同性更同理可推——因此普遍接受了女性選擇共同居住的現象。根據費德曼的研究，十九世紀後期有不少女權運動者、「新女性」與學有專精的女性菁英選擇同居甚至共渡一生，蔚為一股所謂的「波士頓式婚姻」（Boston

⁹ 根據另一位學者 Carolyn Woodward 的研究，十八、九世紀社會普遍認為性慾求必定源自於陽具，因此一般甚難想像女性之間會有性慾求。不過，女性的某些諸如嚴重的變裝癖，或是利用變裝的偽裝（假男人）以騙取其他女性與其結婚，以及在性行為中使用假陽具作穿透等行為，卻因為嚴重威脅到男性地位而受到嚴厲譴責（843）。

¹⁰ 根據費德曼的研究，美國在南北戰爭中損失了大約三百萬左右的適婚年齡男性，使得單身女性的人口數相對增加。再加上西部開發與工業城市的興起，使得年輕男性紛紛從鄉野小鎮外移到工作機會較多的都市裏謀生，這也使得女性擇偶對象大幅減少（183）。

marriage) 的風氣。¹¹ 她認為詹姆斯 (Henry James) 的小說《波士頓人》(1885) 所描寫的便是這種「新英格蘭常見的女性友誼」，這也是詹姆斯在觀察了妹妹愛麗斯 (Alice James) 與女性友人凱塞琳·洛林 (Katherine Loring) 之間一段長達十四年之久的愛戀關係後而寫成的。同一時期選擇共渡一生的女性「浪漫情侶」還包括了小說家莎拉·歐內·茱耶特 (Sarah Orne Jewett) 與安妮·菲爾茲 (Annie Fields)，以及薇拉·凱塞 (Willa Cather) 與伊底絲·路易斯 (Edith Lewis) 等人。這些女性在波士頓與美國其他地方不僅共同生活，甚且還形成廣泛的社交圈，彼此扶持打氣。不過，費德曼的假說卻認為這些女性浪漫情侶基本而言是不含帶性關係的 (asexual)。這種女性同性關係是廣為社會所鼓勵與尊重的，因此浪漫情誼「在各方面而言被認為是高尙而尊貴的」。就這一點而言，費德曼的論調與史密斯羅森柏格大底是一致的，她們都認為十九世紀女性浪漫情誼是「普遍為社會所接受，並且完全相容於異性戀的婚姻裡」(Smith-Rosenberg 1975: 16)。因為這些女性愛侶是處於二十世紀性學盛行之前的所謂純淨的、田園般的女性浪漫情誼的「黃金年代」裏。¹²

¹¹ 女性主義學者 Kate McCullough 曾在 “The Boston Marriage as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1997) 一文中，將「波士頓式婚姻」定義為十九世紀一群「備受社會敬重」的白種女性，雙雙對對地同居在大多由女性所組成的社群裡。她們一方面共同致力於促使其他女性積極投入公領域如社會與經濟改革等運動，另一方面則極力鞏固女性在私領域裡的彼此團結。McCullough 同時也認為「波士頓式婚姻」與另外一類普遍存在於 1870 年左右大學校園裡，女性師生或學姊、學妹之間因住宿而產生的「一時迷戀」(“crushes”) 其實是有不同的 (68, 69, 96)。

¹² 評論家 Lisa Moore 曾在 “Something More Tender Still Than Friendship” (1992) 一文中反駁 Lillian Faderman 與 Carroll Smith-Rosenberg 的看法，她認為上述兩位史學家的研究忽視了十八、九世紀女性彼此交往時所持的謹慎態度，以及圍繞在她們四周整個社會的禁制氛圍，以致於過份理想化了當時社會對此一現象的接受度 (501)。另一位評論家 Martha Vicinus 也懷疑費德曼與史密斯羅森柏格「可能過度誇大了十九世紀對於女性浪漫情誼」的接受度 (483)。她的論點主要放在十九世紀前半葉——所謂的女性同性浪漫情誼

沃頓的《歡樂之家》出版於 1905 年的事實，使它成為修瓦特所說的處於美國跨世紀兩個不同時期女性小說的過渡期代表作之一。著名的女性學者貝姆（Nina Baym）在其《女性小說》（1978）一書中曾表示，十九世紀中葉的女性小說中，有不少是圍繞在一位「被剝奪掉其賴以維生的經濟支柱，並且面臨到必須自食其力的年輕女子」的情節安排上。而這一類小說中的女主人翁則通常在經歷過一連串的考驗與磨練之後，經由她個人絕佳的「智慧、意志力、靈巧與勇氣」，終於得以克服萬難並且嫁為人婦。小說中之所以安排她走入婚姻，為的只是凸顯女主人翁業已發展成為一個成熟女性（female maturity）的事實。然而，貝姆卻認為小說中女主人翁歷經種種折難的最終目的並非為了要成為人妻；因為在她的情感層面上，她與其他女性間的交往遠比與男性（丈夫）相處要來得更重要些（11, 23, 39）。

就這一點而言，沃頓的《歡樂之家》即著重於改寫此一十九世紀女性小說傳統。首先，沃頓的文本中雖然清楚地觸及了貝姆所說的女性小說傳統——莉莉·巴特在小說結尾時，的確被剝奪掉她自幼被教導並期待應該得到的經濟與情感雙重支柱，同時更因為她出身於安逸有閒的紐約上層社會，她在成長環境裏也欠缺了謀生所需各項技能的訓練。然而，沃頓旺盛的企圖心顯然使她意圖超越傅立曼（Mary Wilkins Freeman）與茱耶特等在當時廣受好評的新英格蘭「地方色彩」女作家（New England local colorists）。因此，《歡樂之家》可說是同時援引（allude to）卻又嘗試顛覆（subvert）當時盛行的女性小說傳統。關於此點，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從沃頓原擬採用的書名中瞭解一二。如眾所周知，《歡樂之家》的書名出處是來自於舊約聖經「傳道書」

的「黃金年代」——即有不少相關醫學與法律論述開始以病態的角度去討論女性同性戀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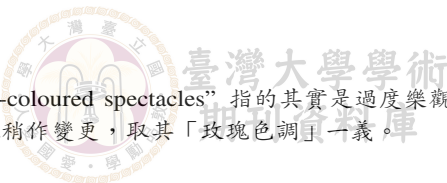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Ecclesiastes*) 第七章第四節：「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但是，在 1905 年最後出版的《歡樂之家》之前，沃頓曾經考慮過使用另外兩個書名：「短暫的裝飾」(*A Moment's Ornament*) 與「玫瑰的年代」(*The Year of the Rose*)。這兩個最後未被她採用的書名的意涵大底有二：其一是一般評論家所認為的，沃頓旨在譏諷當時紐約社會對於女性應該扮演的（即便是短暫的）「美麗與裝飾」角色；其二則是沃頓意在暗指莉莉與文本中的猶太暴發戶新貴，同時也是莉莉忠誠追求者的賽門·羅斯戴爾 (*Simon Rosedale*) 之間的相似之處，與兩人之間可能出現(但最後卻被沃頓否決掉)的婚姻結局(*Goldsmith 380*)。

除了上述兩種意涵外，我認為沃頓在創作《歡樂之家》之初，極有可能是想要凸顯她與其他新英格蘭「地方色彩」女作家的不同。因為沃頓曾經在其回憶錄《回首來時路》(*A Backward Glance*) 一書中明白指出，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別於新英格蘭最鍾愛的，一群擅長「描寫玫瑰與薰衣草」的女作家 (1003)。此外，沃頓也曾自承她多年來的寫作，為的就是要「如實地描繪生活本質……要完全有別於我的幾位前輩作家，如瑪莉·威肯斯與莎拉·歐內·茱耶特等人，過度樂觀的透過玫瑰色調的眼鏡所看到的世界」(1002)。¹³ 因此，我推論沃頓原先所打算使用的書名之一「玫瑰的年代」，其實暗示了她身處拋開或承繼十九世紀末期新英格蘭「玫瑰色調」女性作家，同時也是「女性文化」支持者如茱耶特等人影響的兩難當中。的確，誠如大多數評論家所主張，沃頓與其他女性作家面臨到相類似的處境，那就是必須在「父親的書房」與「母親的花園」裡做出選擇。早期的評論家

¹³ 沃頓的原文“seen through the rose-coloured spectacles”指的其實是過度樂觀的看待世界或事物，在此我權宜地稍作變更，取其「玫瑰色調」一義。



傾向於主張沃頓這位「所有女性作家中，寫作最像男人的一個」¹⁴——諸如她在處理筆下女性角色時所展現出來的冷靜、苛刻與超然立場——基本上是選擇師承男性前輩作家的。不過，近年來的評論家如愛蒙司（Elizabeth Ammons）則試圖澄清沃頓對於十九世紀美國女性所處的困境，以及她文本中對於女性相關議題的論點，基本上是既複雜卻又帶有悲觀與同情意味的。因此，沃頓對於新英格蘭「地方色彩」女作家所代表的女性文化的態度，以及她在文本中對於女性的呈現，其實是愛恨交織與充滿兩難的。可以說她既想要善加利用父親的書房，卻又割捨不下母親的花園。

其次，沃頓對於故事女主人翁莉莉·巴特年齡上的安排，實誠如本文先前所論及的，二十九歲的她實早已跨過了適婚的少女階段。並且，在小說後期的描寫裡，她已逐漸邁向年華消逝、美貌不再的老處女階段了。然而，莉莉的艱難處境正在於她既非受過高等教育、具有濃厚社會意識的「新女性」，又非獨立自主、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不婚藝術家，更不是威肯斯與茱耶特等「地方色彩」女作家筆下經常出現，堅持抱守舊時傳統的老婦人。由此可見，走入婚姻似乎是莉莉唯一的出路。因此，異性戀婚姻主軸在《歡樂之家》文本中自然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這也是為什麼《歡樂之家》裡，有不少篇幅是放在描繪莉莉與幾位可能的結婚對象，如勞倫斯·謝爾敦（Lawrence Selden）、波西·葛來司（Percy Gryce）與賽門·羅斯戴爾等異性身上。另外，相較於以母親的花園做為主題與傳承的新英格蘭「地方色彩」女性作家，沃頓的《歡樂之家》中對於母女關係與女性同性情誼的刻畫，表面上看來，其格局似乎遠不及這些女作家的文本。然而，誠如耶瑟爾（Ruth B. Yeazell）所觀察的，《歡樂之家》基本而言是個

¹⁴ 參見與沃頓同時期的評論家 Helen & Wilson Follett 於其 1919 年的著作 *Some Modern Novelists: Appreciations and Estimates*, p. 291 中所言。

「女人的世界」（718）。女性之間充滿「憎恨與報復」的行為，事實上已經變成左右《歡樂之家》情節發展的最主要動機了（Lidoff 535）。因此，有關母女關係與女性同性情誼的描述，實佔了《歡樂之家》文本中相當重要的位置。關於此點，麗朵夫曾經一針見血地表示：「莉莉與小說中男性角色之間的關係，其關鍵所在，實繫於她與其他女性之間的關係」（535）。換言之，《歡樂之家》文本中異性戀主軸的發展，其實還有賴於其同性情誼副軸的發展。本文接著將針對此一同性情誼副軸詳加分析，論述焦點主要是放在莉莉·巴特與幾位親人：母親、姑媽、表姊，以及幾位女性友人茱蒂·崔納、蓓塔·朵塞、歌蒂·法瑞琪與涅蒂·史陀瑟等人之間的關係上。

母愛匱乏／區隔與個人化的不完全： 莉莉·巴特的女性至親

有關女性同性情誼的分析，我們可以先從莉莉與母親的關係談起。莉莉的母親「精力充沛又十分果決」（*HM*, 28-29），向來厭惡貧困的生活。她認為「過得像豬一般的」貧窮生活簡直就是一種恥辱。因此，她在莉莉十九歲那一年時，便因為長久以來過著入不敷出的奢華生活，而終於把自己的丈夫給折騰破產後抑鬱寡歡而死。接著，巴特夫人便開始帶著莉莉投靠一個又一個的親戚，並將莉莉的美麗外表視為她們母女重返上層社會的最佳利器，甚至是她向自己乖舛的命運復仇的一種方法。巴特夫人除了經常「充滿熱情」地端詳女兒的美麗外表外，她還「滿懷嫉妒地」私下認為莉莉的美貌其實是她所有物，而莉莉只不過是她美麗外表的「看管者」而已（*HM*, 34）。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學者蘇立文（Ellie R. Sullivan）曾表示，莉莉·巴特因「欠缺充足母愛」所受的苦，充分反映了沃頓與自己母親盧葵西亞·瓊斯（Lucretia

Jones) 之間長年關係的不睦(472)。藝術家女兒沃頓, 在面臨到奉行維多利亞時期「家中天使」作為典範的瓊斯夫人的嚴厲教誨時, 選擇在被客體關係學者維尼寇特(D. W. Winnicott)定義為藝術家「轉移空間」¹⁵的創作中, 藉由決定莉莉與母親角色間關係的發展, 進一步思索自己與母親之間的衝突關係。

近來一些研究母女關係的學者如邱德洛(Nancy Chodorow)等人認為母親對待兒子與女兒的態度往往有別。她認為男孩自小便被母親視為「他者」, 因此很自然地就被母親推往獨立與差異的道路去發展。而女兒則因為與母親擁有相同性別, 而傾向於延長與母親在前伊底帕斯時期的共生式依戀(pre-Oedipal symbiotic attachment), 並且有可能發展出分界不明的自我(fluid ego boundary)來。母親更是經常視女兒為其個人的延伸, 並且傾向於阻止女兒去發展她個別的自我。邱德洛認為:

由於與女兒性別相同, 也由於自己曾經身為女孩, 女童的母親與男童的母親自然有所不同; 她傾向於不把女童視為與自己有所區別。雖然這兩種母親都有可能感受到自己與兒子或女兒是一體的, 也是連續的。但是, 作為一個擁有女兒的母親, 這種感覺會比較強烈些。……[她]會將女兒視為母親的一個延伸或是替身; 至於把女兒看作是一個具有性欲的他者, 則通常是較為薄弱而罕見的情形。(109)

¹⁵ 依照 D. W. Winnicott 的看法, 幼兒經常會賦予自己身邊的實體如毯子或餐巾等物品特殊的意義與地位, 藉此讓自己能夠從與母親之間最初的口腔期關係, 成功地轉移到真正的客體關係上。這個對幼兒具有特殊意義的毯子或餐巾便是所謂的「轉移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Winnicott 接著又將此一理論應用到藝術創作上, 他認為對藝術家或作家而言, 他們的作品便是他們用來代替母親的「轉移客體」, 而他們的創作靈感則是源自於這個「轉移空間」(transitional space) (Playing and Reality 1971: 107)。

從邱德洛的客體關係理論來看，除了母親經常視女兒為其個人的延伸外，女兒們則一方面渴望保有與母親在前伊底帕斯時期的共生式依戀，卻另一方面因感受到此一依戀所帶來的種種束縛，再加上渴求獨立，因而轉向父親處尋求發展愛戀關係。邱德洛認為女兒之所以會轉向愛戀父親，並非如佛洛伊德所言是起因於女性的陽具欣羨。而是因為女兒一方面受到了父親的鼓勵，要求將他納為愛戀對象，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對女兒而言，愛戀父親代表了自己的自主（autonomy）與獨立（independence）。然而，邱德洛也認為女兒在轉向愛戀父親的同時，卻仍然會「不時地回頭望著母親」（125）。¹⁶

莉莉對母親巴特夫人即存在著這種強烈依戀，因為她在二十一歲其母親去世之前，一直都是以母命為依歸，順從母親的期望，一心一意想藉由嫁入豪門來解決母女共同面臨的經濟困境。但是，根據邱德洛的理論，莉莉的強烈戀母與分界不明的自我，卻容易使她陷入擺盪在「與母親之外的任何一個人作認同，以及界定自己是母親的一個替身或延伸」兩種抉擇之間（138）。換言之，莉莉在《歡樂之家》中所遇到的幾位女性角色，就某方面而言，可以說代表了她所追求的，母親之外的認同對象；同時也意味著她渴望得到的藉以取代母親的對象。誠如麗朵夫所觀察，莉莉在面對如何妥善處理男女兩性關係（婚姻的抉擇），與她能否承擔成熟女性所該有的責任等兩大問題時，處處表現出來的困窘與無能，其關鍵所在其實是起因於她缺乏足夠的母愛與支持（535）。莉莉曾在小說第八章中，在聽到依薇·范奧斯本（Evie

¹⁶ 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女童發展到伊底帕斯時期時，將不可避免地會將愛戀的對象由母親轉移到父親身上。邱德洛對此則持相反看法，她認為女童自始至終並未放棄或壓抑對母親的愛戀。她祇是在愛戀母親的同時，再加上一份對父親的愛戀而已：「誠如我們所見，女孩並非斷然地把對母親的愛戀轉移到父親身上；她祇是把父親也加入對她息息相關的主要客體當中罷了」（Chodorow 167）。

Van Osburgh)即將嫁給自己屬意的單身富豪葛來司時,不禁羨慕地暗想著:「能在母親的關愛下長大的女孩真是幸運……只有在作母親的正確無誤的看守與遠見之下,女兒們才得以順利地找到如意郎君」(HM, 94-95)。而當莉莉逐步從上層社會不斷地向下沈淪時,她與周遭幾位女性親戚與友人的相處,卻也反映出她在尋求母親認同與替代者時所遭遇到的一連串挫折與失敗。

莉莉在母親過世之後,寡居的姑母潘妮斯頓夫人便成為她的監護人,然而,深以舊紐約望族之後自居的富裕姑母,代表的正是《歡樂之家》文本中「金錢代表真愛」的愚昧輕浮社會取向。¹⁷她偶而贈予莉莉昂貴的禮物與華服,一方面顯示她大權在握的施惠者地位,以小恩小惠促使莉莉對她格外倚賴:「潘妮斯頓夫人喜歡藉由不時給予莉莉支票,而得到對方的感激。並且,她或許也很精明地知道藉由這種施惠方式,可以讓她的外甥女對她長保倚賴之心」(HM, 38)。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凸顯莉莉作為家族美麗的裝飾品之一的功能,就如同她對自家會客室中的地毯、窗牖與雕像那種近乎狂熱的重視。不過,潘妮斯頓夫人儘管十分喜愛柔順可人又善解人意的甥女莉莉,遠勝過那位經常陪伴她聊天解悶的遠房親戚葛蕾絲·史黛妮(Grace Stepney)。但是,她卻始終無法成為莉莉所企求的母親替代者:「她與姑母關係的淡薄,就好像兩個在樓梯間偶然相遇的房客一樣」(HM, 156)。另外,莉莉本人對待她另一位親戚,也就是表姊史黛妮的態度也有其可議之處。她不僅無視於那位既老又窮的表姊的存在,更常常不經意地冷落與傷害她,以致於引起後者對她的嫉妒與排斥。

¹⁷ 沃頓曾在回憶錄 *A Backward Glance* 中談到她寫作《歡樂之家》的目的,主要是要揭露她所處的那個愚昧而輕浮的社會中,一群不負責任的尋歡作樂人們,如何悲劇般地貶損人們與他們的理想:“The answer was that a frivolous society can acquire dramatic significance only through what its frivolity destroys. Its tragic implication lies in its power of debasing people and ideals. The answer, in short, was my heroine, Lily Bart” (207).

最後，在潘妮斯頓夫人臨終之前，甚至還因為受到史黛妮的挑撥影響，除去了莉莉原本應有的財產繼承權。因此，與莉莉血緣至親的姑母與表姊對待她的態度，恰巧印證了評論家梅肯（Janet Malcolm）所說的，沃頓的《歡樂之家》裡到處充斥著「女性彼此之間冷酷無情」的面貌（11）。莉莉在這兩位女性親人身上既無法找到認同，更看不到母親替代者的影子。

除了欠缺足夠的母愛——不論是來自巴特夫人或是姑母與表姊——莉莉也無法與母親全然作出區隔（separation），更遑論完成她個人化（individuation）的過程。女性主義學者芙蕾司（Jane Flax）延續了邱德洛的母女關係理論，並進一步強調女性在幼兒時期的發展，的確影響到她們成熟後的同性友誼關係。她認為成熟女性在與同性友人的親密關係中，同時需要感受到自己的獨立與對方的照護，這雙重需要可以追溯到女性童年時期與母親之間的關係上。依據芙蕾司的看法，幼兒在發展初期最需要的便是在生理與心理上脫離母親，並且完成個人化過程。個人化過程的完成，包括了發展出一些屬於個人的個性、技能與特質。然而，為了讓女兒們的個人化過程得以順利進行，作母親的必須在與女兒共生式依戀關係中，持續提供給女兒們合理範圍內零衝突的情感養護。而當女兒一旦渴望脫離並且進入了個人化過程時，作母親的便必須自動放棄依戀關係，並且讓幼兒盡情地陶醉在自己新發展出來的技能與獨立人格特質中（175-76）。就莉莉·巴特的情況而言，她因為母親持續視她為自己的延伸/財產，並且不願放棄與女兒二而一的共生式依戀關係，因此長久以來一直無法與母親成功地作出區隔，也不能真正完成個人化過程，從而擁有屬於她個人的技能與人格特質。巴特夫人視莉莉的美貌為覓得良緣與為母女倆解決經濟困境的「最後資產」，自然而然地也被莉莉內化為自己的追求目標。同時，她在小說開始時曾經認為自己抱持充分「自主權」（possessionship）地穿梭於紐約上層社會，其實不

過是個假象而已。因為不久之後，她便體認出自己「正在她一度認為擁有的廣大空間裡，不斷地掙扎著一小片立足之地」（38）。莉莉因為被母親視為其個人財產而缺乏充分自主權，恰好與她隨後遭遇姑母取消財產繼承權兩相呼應，也顯示出沃頓在文本中大量運用財產論述來描繪莉莉處境的意圖絕非偶然。

不過，芙蕾司同時也認為就母親的角度而言，一方面由於與女兒之間的自我疆界是流動而分界不明的，另一方面則因為父權體系與社會普遍的恐同傾向，通常只會促使母親與兒子而非女兒產生親密依戀，再加上與女兒的互動過程中，經常會喚起母親本人童年時期尚未解決的母女衝突，因此，在女兒們的區隔／個人化過程裡，母親較難時時提供她們充足的養護。就某個程度而言，芙蕾司的理論也解釋了為何莉莉始終得不到來自母親與兩位女性至親足夠的照護與關愛的原因。而正因為如此，對於像莉莉一樣的女兒而言，母親在她發展過程中態度的曖昧不明與有所保留，卻大大地挫傷了她區隔與個人化過程的完成。她不僅在區隔／個人化過程初期感受到母親並未全力支持她，在個人化過程最終的重修舊好時期（*rapprochement*）裡，女兒則無法像兒子一樣成功地脫離母親，並且在與父親認同後形塑出一個具有自主性的自我來。她也無法像兒子一樣，可以在日後從另外一位女性伴侶身上得到母親替代者。因此，根據芙蕾司的理論，女兒們因為不斷地陷入渴望母親呵護與尋求獨立自主的矛盾衝突中，她們將永遠無法完全脫離母親，更無法完成全部個人化過程（177-79）。不過，對於女兒們在發展時期所受到的煎熬與痛苦，邱德洛在《母職再造》（1978）中曾表示，女性可以從日後與自己子女的關係中，再造先前與母親的共生式依戀關係，並因此得到她們所需的情感（206-07），芙蕾司則進一步主張女性將可以在成長後，藉由與其他女性朋友的友誼交往得到緩解與治療。因此，莉莉身邊的幾位女性朋友，在她歷經了與母親區隔／個人化過程失敗，與

尋求母親認同與替代者遭挫之後，便扮演起異常重要的角色。

善良母親與邪惡後母：莉莉·巴特的貴婦好友

一向被莉莉暱稱為「最好朋友」的貴婦茱蒂·崔納，她也會像潘妮斯頓夫人一樣，不時地給予莉莉金錢或是衣服等作為禮物，甚至會在自家貝洛蒙別墅的宴會場合中，與其他女性訪客一起聯手安排莉莉與炙手可熱的單身富豪葛來司有更多私下獨處的機會，以便撮合她們兩人的婚事。於是，在茱蒂的精心安排下，應邀到貝洛蒙度假的莉莉，發現到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覺中，儼然已經成為一個「女性關懷氛圍」（*feminine solicitude*）的中心（*HM*, 47）。所有來到貝洛蒙度假的女性友人，在茱蒂暗示之下，都不約而同的自我閃躲，以便成全莉莉對葛來司的追求，因此無形之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女性儀典」（*female ritual*）。茱蒂不僅刻意為莉莉邀請了葛來司一起到貝洛蒙度假，仔細幫她分析了鳳求凰的追求策略，甚至還警告莉莉要提防蓓塔·朵塞這一號「危險人物」。簡言之，崔納夫人告訴莉莉：「為了讓妳高興，沒有我不肯做的」（*HM*, 46）。在小說前半部分中，莉莉與茱蒂之間的這一段友誼，可以說非常接近新英格蘭「地方色彩」女作家筆下所歌頌的女性同性情誼。只不過，沃頓對於此一「女性文化」所標榜與重視的同性社交世界，其實是充滿了愛恨交織的複雜情緒。因此，底下《歡樂之家》文本前半（*Book I*）第四章中一段描寫茱蒂個性的文字，到了後半部份（*Book II*）幾乎改了個樣：

〔茱蒂〕大刺刺的個性使她少去了同性之間常見的彼此敵對態度，同時，她也只會仇視那些宴會辦得比她更盛大、比她更有趣的女人。此外，她的社交長才，再加上崔納先生的巨額銀行存款，也使她在同輩當中幾乎所向

披靡。而她在社交上的成功，也使她毫無保留地對其他女性友人展現出無比善意。在巴特小姐對其女性朋友的分類裡，崔納夫人應該稱得上是最不可能會「背棄」她的一位。（*HM*, 41）

這主要是因為到後來，茱蒂一旦發現莉莉竟然犯下她的大忌，步上楷莉·費雪（*Carry Fisher*）的後塵，接受了丈夫葛司的金錢資助時，便毫不考慮地選擇「背棄」莉莉，終止兩人長久以來的友誼。在這一段與崔納夫婦之間的三角關係中，莉莉天真地以為委託好友茱蒂的丈夫葛司代為投資理財，憑藉的是一種父兄般的親密關係（*HM*, 85）。雖然，莉莉心裡也明白葛司願意對她伸出援手，其實是另有所圖，絕非出自父兄輩的情誼。莉莉的明知故犯，事實上並非如顧德曼（*Susan Goodman*）所言，莉莉對好友茱蒂而言是個「圖私利又不忠心」的朋友（55）。在這一段三角關係裡，莉莉選擇葛司而捨棄茱蒂的作為，或許可以從精神分析角度來看，那就是莉莉此舉是嘗試放棄與母親在前伊底帕斯時期的共生式依戀，因渴求獨立轉而選擇父親作為愛戀對象，並因此得以進入伊底帕斯時期。然而，莉莉所認為最不可能會背棄她的茱蒂，說穿了其實與她母親巴特夫人一樣，都屬於不夠稱職的母親角色（*inadequate mother figures*），最後終於還是選擇棄她而去。在芙蕾司的理論中，良性發展的女性情誼不僅有助於女兒們發展獨立人格，同時更可以讓女性得到充足的情感養護。但是，如果是像茱蒂般不夠稱職的母性呵護，則反而會讓女性陷入極度受傷與被人背叛的負面情緒中（179-80）。

莉莉與另一位貴婦好友蓓塔·朵塞之間的關係則又遠比與茱蒂的關係要複雜許多。如果說茱蒂扮演的是莉莉「善良的母親」



角色，那麼，蓓塔則代表了莉莉「邪惡的後母」。¹⁸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邪惡後母」的形象，通常是幼童因為受到母親管教或懲處她錯誤行為（如自慰）時，產生了敵意、懼怕與怨恨之情，再轉而投射到母親身上而產生的。對此，佛洛伊德在其 1931 年的“Female Sexuality”一文中，曾提及他觀察到女童有著「令人驚奇，但卻又常見的」「被母親殺害（或吞噬）」的恐懼心理（1974: 54）。他認為女童對母親的懼怕心理，應該是「由於母親在教養與照料她身體時，對她設下種種限制」而產生（1974: 55）。他同時還表示：「很難說〔女童〕此種心態……是否經常因母親無意識，但卻被女童察覺出來的敵意，而得到增強作用」（1974: 59）。因此，就如同描繪男性成長的傳奇小說中，被投射出來的邪惡的女性角色（母親、妻子或情人）一樣，只要這個後母始終無法被女主人翁所擁有（owned）或是融合（reintegrated），她的存在將會持續阻礙女主人翁邁向成熟發展之路。這也正是蓓塔在莉莉成長／熟階段所扮演的角色。

修瓦特曾經考據出距離《歡樂之家》半世紀之前出版的另一個母文本（mother-text）：依莉莎白·史密斯 1854 年所著的《蓓塔與莉莉》（*Bertha and Lily*），以此作為證明沃頓其實還是在一個較大的文學傳統裏從事寫作的依據，只不過沃頓的「創作焦慮」促使她對前輩的文本（precursor text）作了不少修正（revision）而已。史密斯的母文本裡所描寫的是母親蓓塔與私生女莉莉之間的關係，小說結尾時，犯錯的母親蓓塔面臨到的是痛苦與絕望，但是，女兒莉莉卻被賦予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139）。的確，沃頓的《歡樂之家》中大幅改寫了史密斯小說中的母女關係。首

¹⁸ 根據 Joan Lidoff 的看法，沃頓的《歡樂之家》中到處充斥著童話故事的典故。她認為沃頓不僅使用童話故事中常見的魔法來描繪莉莉，賦予她神力，同時也讓莉莉扮演了「睡美人」（Sleeping Beauty）的角色，而蓓塔·朵塞則是莉莉邪惡的後母（527）。

先，蓓塔因為嫉妒莉莉與她的舊情人謝爾敦之間若有似無的曖昧關係，憤而從中破壞莉莉與葛來司的婚事。接著，蓓塔又為了遮掩她自己的婚外情而當眾羞辱莉莉，暗指莉莉與她丈夫喬治有染，並拒絕讓莉莉重返眾人同遊歐洲時所搭乘的遊艇「莎布琳娜」號。故事結尾時，她這個犯錯的母親非但沒有面臨到痛苦與絕望的惡果，甚至還在倍嚐出軌的樂趣之後，又得以保住她的婚姻、地位與權力。總之，就如同茱蒂所形容的，蓓塔「總是能得到所有她想要的」（HM, 45）。此外，莉莉的際遇則遠不如史密斯筆下的女兒那麼幸運了，她最後在經濟與感情雙雙受挫之後，終於被迫走上了絕路。

誠如迪莫克（Wai-Chee Dimock）所觀察的，在《歡樂之家》文本中，權力雖然仍是以父權為中心，但是，實際掌控權力的卻通常是女性，而非男性（377）。評論家艾倫伯（Lewis Erenberg）也曾表示，十九世紀末期，社會上主要的領導者經常是「有權勢男人的妻子……因為社會提供給她們太少的經濟或是政治角色可供扮演，因此，這些女性便無所不用其極地在社會上發揮其影響力」（13）。此外，沃頓在《歡樂之家》中關注的是權力施行的模式與範圍，而不是權力形成的原因。她所要呈現的尤其是女性所慣常使用的，甚至比男性更冷酷無情的一種屬於「社交」權力的運用。蓓塔之所以總能為所欲為，得到所有她想要的，原因不外有二：其一是維多利亞時期賦予已婚的上層社會女性較多的自由；她可以作出一些破壞社會傳統法則的事如抽煙、打牌，甚至調情、出軌，而不至於被冠上墮落的惡名。¹⁹ 相較之下，如莉莉般未婚的有閒階級女性則因其高可見度而容易被當成一件「美麗的商品」（beautiful object）般物化，因此喪失其自由與主體性。

¹⁹ 這主要還是因為 Bertha Dorset 是屬於新紐約的上層社會家族，否則，她的種種破壞社會傳統法則的行徑，在舊紐約世家如 Mrs. Peniston 等人眼中看來，仍然是難以接受的。



其二是蓓塔有她丈夫喬治·朵塞雄厚的資產作為她的後盾，沒有人敢輕忽或怠慢她；再加上她深諳市場交易法則，因此，比起葛司·崔納付出金錢卻無法得到莉莉實質的回報，蓓塔卻完全能從莉莉那兒成功地「交易」換回她所付出的每一分錢（Dimock 378）。她之所以邀請莉莉搭乘「莎布琳娜」號遊艇同遊地中海，為的就是要讓美麗又善解人意的莉莉陪伴並且轉移丈夫的注意力，使她得以遂行其出軌的樂趣。但是，相較之下，莉莉在三個月的奢華享樂與看似無憂無慮的歐洲遊艇之旅後，回到國內後不僅淑女名聲受損，姑母遺產繼承權被剝奪，並且，還因此漸漸被逐出上層社會，淪落成爲衣帽工廠的女工，最後在走投無路之下，服用安眠藥自盡，其代價不可謂不大。

然而，蓓塔雖然被大多數的評論家公認為是文本中一個壞事作盡的惡徒（villain），她的所作所為幾乎左右了莉莉悲慘的命運與小說情節的主要發展，不過，評論家對她的評論也不全是負面的。就有評論家認為蓓塔是文本中「唯一一位完全解放的成熟女性」，她處事積極，有權有勢，充滿性慾而又十分邪惡（Lidoff 536）。莉莉與蓓塔之間的互動，可以從底下兩個描繪三角關係的事件中分別見出大概。莉莉在小說前半部的第三章中，從貝洛蒙別墅二樓樓梯俯瞰一樓大廳裏正在打牌的一群貴婦朋友時，突然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與貴婦之間極大的差別。尤其是當她注意到穿戴著一身像「蛇蠍般」閃亮發光首飾的蓓塔，正逐步地將自己的獵物葛來司拉向一個隱密的角落去談話時，感覺特別明顯：

巴特小姐倒不是害怕會因此而失去自己對葛來司的掌控；朵塞夫人或許會令葛來司為之感到一時目眩神迷，但是，她卻缺少擄獲他的技巧與耐性。蓓塔太過熱中於自己私欲的滿足，以致於無法真正穿透葛來司羞怯的內心深處。況且，她又何苦給自己找麻煩呢？說穿了，她

至多會拿葛來司的單純個性消遣個把個夜晚而已……
不過，莉莉·巴特光是想到這個女人可以如此為所欲為地將一個男人把玩一番之後，又若無其事地將他棄擲一旁，心中不禁感到萬分欣羨。（HM, 24-25）

莉莉儘管聲稱自己並不害怕，其實她對於蓓塔「蛇蠍般」掌控男人的技巧，應該是充滿戒心的。同時，她並不諱言自己十分羨慕蓓塔有能力將男人把玩在手掌上。莉莉的這一番告白，充分顯示出她將蓓塔視為既是競爭對手，同時也是一個學習的對象。蓓塔那毫不遮掩的情慾流露與她攻無不克的情場戰果，再加上她丈夫雄厚的社經地位所帶給她的層層保障，在在都是純潔守貞、優柔寡斷與經濟困窘的莉莉所不及的。她在欣羨之餘，不自主地起了倣尤之心，暫時放下原先辛苦追求的富豪葛來司，而陷入了另外一場與蓓塔競逐博取同一個男人——勞倫斯·謝爾敦——青睞的三角關係中。莉莉之所以會在與謝爾敦相識八年之後，才在貝洛蒙驚覺到自己被他深深吸引住，除了謝爾敦所展現出來異於其他上層社會人士的特質，諸如他過人的洞察力、非凡的美感品味與對財富的不屑態度，應該還包括莉莉目睹並且感受到謝爾敦在面對蓓塔的追求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溫文爾雅的熱情」。換言之，其實是蓓塔的追求謝爾敦，方才喚起莉莉去正視自己的情慾；只可惜最後莉莉的情慾卻只在萌芽的階段就嘎然而止了。²⁰

莉莉除了因為捲入與蓓塔、謝爾敦之間的三角關係而被迫面對自己的情慾外，她與這位「邪惡後母」之間的關係，在莉莉擁有蓓塔寫給謝爾敦的情書一事中，張力最為明顯。在小說前半部

²⁰ 有關莉莉·巴特未完全發展出來的情慾，評論家 Gary Lindberg 曾在 *Edith Wharton and the Novel of Manners* (1975) 一書中表示過，沃頓小說中的主人翁經常都是發展不完全，甚至是無能的：“In terms of their passions, their assertions of will, their ideals and intuitions, they seem impotent” (173)。

第九章裏，莉莉從清潔婦海芬太太手中意外地購得了一疊蓓塔過去寫給謝爾敦的情書。莉莉深知以喬治·朵塞的脾氣，任何人只要持有這些情書，將可以輕易地摧毀掉蓓塔的一生。但是，莉莉在擁有這些原本該被謝爾敦撕毀處理掉的信件整整兩年之後，在飽受蓓塔誣陷欺凌，以及被其他上層社會朋友排擠的情況下，卻在一念之間，選擇將這些足以讓她拿來作為回復上層社會工具的信件全數燒毀。至於莉莉最後之所以沒有接受追求者羅斯戴爾符合市場交易法則的建議，利用這些信件作為與蓓塔斡旋的籌碼，以便能夠藉此重回上層社會，並且交易換取羅斯戴爾的婚約，大部分評論家都認為其主要原因不外有三：其一是由於莉莉對謝爾敦存有一種近乎自我犧牲般的愛意，她不願看到謝爾敦因為沒有妥善處理好與蓓塔之間的一段婚外情，而受到社會譴責；其二是莉莉不願意降低自己的身份與格調，淪為與海芬太太等人相同的低下道德水準；其三則是如費特麗（Judith Fetterley）所說的，莉莉在某種程度上看輕與仇恨自己，因此才會作出此種近乎自我毀滅的行徑（210）。然而，廣為評論家所忽視的倒是莉莉對於蓓塔信件的内容所抱持的態度。因為當海芬太太將情書攤平放在莉莉面前時，很明顯的，莉莉立即意識到自己正觸及一種「經常被眾人在背後議論」，但她卻從未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處身其中的「可恥事件」（*HM*, 108）。事實上，這個可恥事件中真正讓莉莉覺得「厭惡」與「恐懼」的，應該是蓓塔信件内容裡所展露出來的十足情慾。蓓塔情書中的這種屬於成熟女性該有的情慾，恐怕是莉莉有心認同與仿效，但卻始終無法成功掌握到的女性特質。莉莉無法充分擁有發展完全的女性情慾，主要也是起因於她未能與母親充分區隔與個人化不完全之故。另外，正如前文所提到過的，蓓塔這位「邪惡後母」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成熟女性的情慾，因為無法被莉莉所擁有或融合，因此也阻礙了女主人翁邁向成熟發展之路。莉莉嘗試對蓓塔這位「邪惡後母」所作的認同，

終究是充滿挫折與失敗的。

新女性與勞工階層：莉莉·巴特可能的救贖

雖然有評論家如顧德曼等人認為蓓塔是沃頓用來作為莉莉精神與道德救贖的一個根源（49），我倒是認為如果莉莉在小說結尾時果真有救贖的話，²¹ 這救贖應該是來自於她與另外兩位女性——歌蒂·法瑞琪（Gerty Farish）與涅蒂·史陀瑟（Nettie Struther）——之間的關係。在小說前半部第一章裡，莉莉曾經告訴謝爾敦她非常需要一個不會「利用或是辜負」她的朋友（HM, 7）。謝爾敦那位致力於慈善工作的表妹歌蒂，正是莉莉自始至終最忠誠的朋友；歌蒂的貧困處境與平庸的外表使她很難以被納入婚姻市場的考量裏，因此，幫助遭遇不幸女子的社會工作便成為歌蒂主要的職志；莉莉也是經由歌蒂的引介才得以接觸並且資助包括涅蒂等人在內的弱勢勞動階層女性。對於歌蒂平凡的外貌與她那「實用」但卻毫不起眼的穿著打扮，莉莉一開始是帶著既同情又不耐煩的矛盾情緒；她認為像歌蒂一樣的女子，要不就是因為愚蠢，要不就是自找的，才會淪落到如此既窮又醜的地步。但是，歌蒂處境的窮困與不堪，其實正充分預示了（foreshadow）莉莉最終對她所產生的認同。因為，故事結尾時，真正面臨到貧困、絕望甚至死亡的是莉莉本人，而不是歌蒂。

許多評論家都認為歌蒂所代表的，其實正是十九世紀不少女性作家所歌頌的「新女性」。²² 正如前文中所提及的，沃頓的《歡

²¹ 有關莉莉·巴特在小說結尾是否能得到救贖，評論家 Jeanne Boydston 曾在 “Grave Endearing Traditions: Edith Wharton and the Domestic Novel”（1988）一文中表示，莉莉如果有救贖，也只能存在於小說之外的世界，或是發生在我們的信仰裡（35）。

²² Nancy von Rosk 在 “Spectacular Homes and Pastoral Theaters”（2001）一文中曾表示，倘若沃頓的《歡樂之家》是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寫就的，那麼，歌蒂

樂之家》正處於美國跨世紀兩個不同時期女性小說的過渡期；如歌蒂一般的「新女性」角色，在沃頓寫作的二十世紀初期，雖仍有其他女性作家如傅立曼等人加以頌揚，卻不是沃頓關注的焦點所在。因此，在《歡樂之家》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歌蒂一方面抗拒社會要求女性必須走入婚姻，選擇與表哥謝爾敦一樣，獨自在外租屋居住。另一方面，歌蒂十分熱衷於社會改革運動，她積極地在婦女團體裡，幫助一些境遇不如她的勞動階級女性解決她們就業與經濟等問題。上述的這些描述，在在都顯示出沃頓有意將歌蒂塑造成有別於莉莉「淑女」（lady）角色的另一種類型。正如同莉莉在小說一開始時告訴謝爾敦的：「我們倆是非常不同的人；〔歌蒂〕喜歡作善事，而我喜歡找樂子。更何況，她是自由的，而我則不然」（HM, 6）。然而，小說敘述者在第八章中，透過莉莉眼中所看到對歌蒂的描繪，卻帶有不少嘲諷與挖苦的意味：「歌蒂·法瑞琪小姐……代表了平庸與無效率的典型。她的目光坦白直率，笑容清新脫俗，不過，這些優點，通常是一些較具有同情心的人在注意到她平凡灰暗的雙眼與毫無動人線條的雙唇之後，勉強從她臉上尋找出來的。……當然，歌蒂因為自己天生就注定是要與貧困和檻樓為伍，因此，她也聰明地知道要把精力放在參與慈善事業與聆聽音樂會等事項上」（HM, 92）。誠如布艾爾（Lawrence Buell）所瞭解的，沃頓在《歡樂之家》文本裡，有關仕紳階級幫助窮困的勞工階級解決問題的慈善作為，其實是充滿嘲諷意味的（661）。

沃頓對於「新女性」歌蒂一角的態度與安排，其實是如同費特麗（Judith Fetterley）所解讀的一般，在《歡樂之家》中，歌蒂這個角色的作用，其實倒為文本提出了一些「關於沃頓本人的價

（而非莉莉）將極有可能成為小說中的女主人翁。因為若是在當時，歌蒂的一些人格特質如溫婉誠懇與自我犧牲等等，勢必會被刻畫為不可多得的美德，而不是如沃頓文本中所呈現出來的那麼沈悶無趣（327）。資料庫

值觀與道德立場」的難解問題（203）。這些問題之所以難解，我認為其主要原因正如同前文所論述的，沃頓在《歡樂之家》中，同時試圖援引卻又嘗試顛覆當時盛行的女性小說傳統，因此，她對於「新女性」歌蒂一角才會出現如此複雜的情緒，時而正面稱許，時而負向嘲諷。此外，沃頓也有意要塑造歌蒂成為文本中，除了男性觀察者謝爾敦之外的另外一位女性觀察者，以便透過這一男一女兩人的眼光，雙向呈現出「真實的莉莉」與她的處境。因此，在小說第十二章一場著名的布萊爾夫人晚宴中的「活人畫」（*tableaux vivants*）場景裡，讀者可以同時經由謝爾敦與歌蒂的眼中，窺見了莉莉精彩地扮演雷諾的名畫〈洛依夫人〉。這個「活人畫」場景，是由謝爾敦的男性凝視作為開端，他細膩地捕捉到由莉莉的美麗所傳遞出來的一種「詩意的美感」與「永恆的和諧」（*HM*, 141）。但是，同樣一個場景，卻是透過了謝爾敦身旁那位興奮異常的歌蒂來劃下句點：「勞倫斯，她是不是太美了？穿上了那一身簡單的衣服，是不是讓她更惹人憐愛？就像真實的莉莉一樣——我所認識的莉莉」（*HM*, 142）。在布萊爾夫人家所舉辦的晚宴中，當其他上層社會的女性都一一上台扮演不同的「活人畫」時，歌蒂卻選擇在台下扮演一個觀眾，以便能夠「不錯過所有的表演——尤其是莉莉的演出」（*HM*, 139）。作為莉莉多年的好友，歌蒂在自己的租屋裡，常年擺放了一張莉莉的照片。她不僅是莉莉最忠實的女性觀察者與愛慕者，同時也是莉莉追求女性認同者與母親替代者的不二人選。

根據賽菊克（*Eve Sedgwick*）的看法，任何的情慾三角關係（*erotic triangle*），都是「勾勒出慾望與認同之間互動關係」的最佳指標（27）。沃頓便是打算經由「莉莉—歌蒂—謝爾敦」這樣的三角關係，深入去探討女性彼此間攸關「慾望與認同」的互動問題。莉莉、歌蒂和謝爾敦之間所形成的情慾三角，不僅在小說結構上與「莉莉—蓓塔—謝爾敦」的三角關係互相呼應，它同

時也凸顯出《歡樂之家》文本中，女性情誼裏關於慾望與認同議題的重要性。我們注意到在小說中，原本專心為善並且接受獨身命運的歌蒂，在表哥謝爾敦經常造訪，熱烈地與她一同討論和莉莉相關的事情之後，逐漸燃起了對表哥的愛慕之情。雖然，不久之後，當歌蒂發現到莉莉與謝爾敦之間互有好感時，她在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之後，便自動地放棄對表哥的情愫。至於向來以「觀賞」莉莉為樂的謝爾敦，多次拜訪歌蒂的主要目的，無非是想找人分享與交換他對莉莉長期觀察與愛慕的心得。他在親吻表妹時，「唇上所感受的卻是另外一個女人」（*HM*, 169-70）。沃頓筆下的「負面英雄」謝爾敦，在莉莉處境最為艱困，受聘為聲名狼籍的海琦夫人（*Mrs Hatch*）的秘書時，急於要莉莉搬離這些人的謝爾敦，當時並未要求莉莉嫁給他以便解決她的困難，反而是建議莉莉搬去和歌蒂同住：「妳和歌蒂兩人當然可以設法經營出共同的生活，如此一來妳就不需要去另找謀生之路。我知道歌蒂很願意，並且會很高興接受如此的安排」（*HM*, 296）。在「莉莉—歌蒂—謝爾敦」這樣的三角關係裏，懦弱的謝爾敦一再地將自己對莉莉的情感，置換（*displaced*）到表妹歌蒂身上，甚至還建議兩位女性朋友共同生活。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莉莉與歌蒂兩人，又何嘗不是一直將自己對對方的情慾，置換到謝爾敦身上？

在莉莉不斷遭受其他朋友的排擠，而逐漸向下沈淪時，歌蒂卻始終對她不離不棄。莉莉在葛司意圖侵犯她而未果之後的夜晚裏，在驚嚇之餘，也是選擇立即投向歌蒂的懷抱去尋求慰藉。在歌蒂的租屋處，這兩個女人終於迸發出一段充滿同性情慾的關係來：

〔歌蒂〕狹小的公寓裏只有一張床，兩個女孩肩並肩地躺在一起。歌蒂脫下了莉莉的衣服後，說服她喝下一杯

熱茶……她們倆在黑暗中安靜地躺著，歌蒂縮向窄床的外緣，刻意地避開與莉莉的身體作接觸。因為長久以來，她就知道莉莉不喜歡被人擁抱，因此早已學會要克制自己對她的情感流露。然而，今晚她身體的每一條纖維都在閃躲莉莉的接近：對歌蒂而言，聽著身旁的莉莉呼吸，感受到被單的振動，彷彿都是一種折磨。當莉莉翻身時……她的一綹清香秀髮，輕輕地拂過了歌蒂的臉龐。她身體的每一部分都是如此溫熱柔軟，香氣宜人。（HM, 175-76）

很明顯地，在這一段敘述裏，歌蒂對莉莉展現了一種既愛又恨的複雜情緒。因為，就在莉莉掀按她公寓門鈴的前一刻，歌蒂正好因為發現到表哥鍾愛的是莉莉而不是自己，不禁對莉莉燃起一陣嫉妒與仇恨之心。但是，歌蒂在開門見到莉莉出現在家門口時所感受到的「嫌惡之情」（HM, 171），卻在莉莉的秀髮碰觸到她臉龐時，急遽地轉變為濃濃的愛戀之意。在兩人共享的窄床上，當歌蒂完全陷入對身旁莉莉的親密碰觸的遐想時，心中顯然並未浮現出表哥謝爾敦的身影。然而，對比之下，稍早之前歌蒂與表哥的一段談話裡，卻始終是圍繞在莉莉身上打轉。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歌蒂所在乎的不是莉莉搶奪了表哥的情感，而是害怕失去她最珍愛的女性朋友。

就在莉莉最為徬徨無助的這一刻裡，一向厭惡被人擁抱的莉莉，這次倒是主動地對歌蒂的渴望作出了積極的回應：「當歌蒂將雙臂擱置在身體的兩側時……她感覺到來自身旁人兒的一陣啜泣，同時，莉莉也伸出手來摸索，她在碰觸到身旁朋友的手之後，便牢牢地抓住不放」（HM, 176）。最後，在莉莉兩次哭喊著要歌蒂擁抱她時，歌蒂便不發一語地伸出手臂，枕在莉莉的頸子下，「就彷彿一個母親托住幼兒般地，把莉莉的頭攔在自己的

腋窩上」(HM, 296)。莉莉在她一連串追求女性認同者與母親替代者的艱辛過程之後，終於在歌蒂身上找到了她所渴望得到的。在歌蒂臥室裏所發生的這一幕兩女相擁情景，一方面訴說了一種純屬女性的支持網絡的形成，另一方面又將此一情慾以母女關係重新書寫(reinscribed)一遍。如此的重新書寫，恰好印證了邱德洛與芙蕾司等女性主義學者所主張的，成熟女性彼此之間的同性情誼，主要可以用來修補或是治療女性早期在發展時，與母親因區隔不明與個人化過程不完全所產生的一些傷痛。

歌蒂不但以母親般的柔情，呵護著傷痕累累、身心俱疲的莉莉，提供了後者一個絕佳的女性支持網絡，同時在她不斷地勸說莉莉參與社會慈善工作之時，她更是積極地鼓勵莉莉去追求獨立。不過，莉莉與歌蒂之間所迸發出來的同性情慾，終究還是要劃下句點。因為一方面，就如同顧德曼所觀察的，莉莉畢竟還是屬於她所屬的環境的一個產物(54)。莉莉就像霍桑筆下羅帕契尼的女兒(Rappaccini's daughter)一樣，構成她生存主要意義的美麗與優雅，皆有賴於她外在優渥環境來維持：「她整個人都沈浸在她四周奢華的氛圍裡；這種奢華逸樂，正是莉莉所需要的背景，也是她**唯一**能正常呼吸的氣候」(HM, 237)。儘管歌蒂十分有心要幫忙，但是，僅能維持貧困但卻獨立生活的她，卻始終無法真正瞭解與滿足莉莉的需求。莉莉的困境，正如同第一章中謝爾敦對她所作的觀察一樣，很明顯地，「〔莉莉〕是製造她的文明的一個受害者」；而她手上所戴的鐲子，在謝爾敦眼中，就彷彿是將她拴在她的命運之上的鎖鍊一般(HM, 6)。另一方面，我們不妨從女性主義學者愛柏(Elizabeth Abel)的理論來解讀莉莉與歌蒂之間的關係。愛柏曾經將小說中女性好友之間的關係，比擬為精神分析過程中分析師(analyst)與被分析者(analysand)兩人間的互動。她認為女性同性情誼就如同精神分析一樣，她們可以「經由彼此間的親密互動與共同參與從經驗中創造意義的過

程而產生瞭解」(419)。莉莉與歌蒂兩人之間的同性情誼雖然有它正面意義，卻終究有其侷限性。因為原本應該要扮演分析師角色，並給予莉莉協助的歌蒂，永遠只能停留在「仰慕」與「憐惜」好友的層面上。自始至終，歌蒂都無法真正瞭解莉莉的處境與她的問題所在，以致於後者在受到葛司意圖侵害不果後，雖然立即向她尋求安慰與關懷，卻不曾告訴過歌蒂事情發生的經過：「我無法跟妳解釋清楚——因為妳不會明白的」(HM, 173)。在愛柏的理論中，女性同性朋友間經由相互認可與詮釋，將自己投射到對方身上後，再進一步重塑自我的知彼知己的「映照關係」(mirroring relationship)，在歌蒂與莉莉兩人的關係當中並不存在。此外，她們兩人之間在當天夜晚所迸發出來的短暫情慾，到了翌日清晨卻完全不見了蹤影：「她們倆靜靜地親吻對方，但是卻絲毫未見前一夜的激情」(HM, 177-78)。小說結尾時，莉莉在走投無路，面臨人生最低潮時，與涅蒂·史陀瑟之間的一段偶遇，意外地卻帶給她頓悟般的覺醒。

涅蒂與莉莉之間的關係，大概可以追溯到多年之前。當時，涅蒂在遭受某個上層社會男子始亂終棄之後，又因為工作過勞與遺傳性貧血的摧殘而病倒。但是，幸運的她經由歌蒂所屬的婦女援助團體的引介，輾轉得到莉莉捐助款項的幫助，而得以恢復健康，並且還有一名真心愛她的好心男子願意娶她為妻。涅蒂與莉莉在街頭第二次偶遇時，她的手中還抱著初生不久的女兒。這個女兒，其實是象徵了涅蒂堅定的求生意志與追求快樂生活的決心：「當她那充滿光輝的臉龐，從膝上的幼兒身上抬起時，她的臉上散發出一股勝利般地堅毅神情」(HM, 334)。莉莉正是在涅蒂的廚房裡，從這對母女身上，頭一次「瞥見了生命的延續」，她同時也相信涅蒂的確有能力從自己生命的碎片中找到一股力量，為自己和女兒創造出一個安全舒適的避難所，並且還「追求到存在的主要真理」(HM, 339)。



在涅蒂家的廚房裡，當涅蒂將女兒交給莉莉抱時，莉莉先是感覺到手中的幼兒「如粉紅雲彩或羽絨般地輕盈」。但是，沒過多久，她便逐漸感受到手中的重量慢慢增加，她「彷彿感受到涅蒂的幼兒進入她的體內，並且成為她的一部份」（*HM*, 335）。向來懼怕與人產生親密接觸的莉莉，此刻卻一改常態，將代表新生命的幼兒擁入懷裡，象徵了她渴望一個嶄新生命的到來。涅蒂的幼兒，同時也代表了莉莉若是在充足母愛的情況下，將可能獲致的成長／熟發展。出身勞動階層的涅蒂有辦法憑藉自己的決心與毅力，再加上鍾愛她的男人的幫助，在懸崖邊上為自己與家人建造出一個十分堅固的「鳥巢」。然而，習慣於上層社會優渥生活的莉莉，則相對的無法享有如此的福氣：「築鳥巢必須要有兩個人才辦得到；它需要男人的信念與女人的勇氣」（*HM*, 339）。儘管莉莉也渴望能夠得到涅蒂最終擁有的美好歸宿，婚姻應該是解決她所有問題的唯一途徑，而莉莉自始至終也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經營。從小說文本角度來看，婚姻弔詭地既是莉莉與小說情節發展的唯一途徑，它又是如莉莉般女性角色能否臻於成熟的必然指標。但是，莉莉看待婚姻的真正態度，卻是如同謝爾敦與她在一次交談中所問及的問題一樣：「為何不就這麼向下投入，冒一次險，然後把問題解決掉呢？」對莉莉而言，婚姻不是一件令人愉快並且衷心期待的經驗，而是被她想像成如同自殺般地「向下投入」（*take the plunge*）。

在小說結尾時，莉莉雖然可以參透生命的意義與家庭的價值，並且，她因為缺乏充足母愛而不斷地在包含了姑母、表姊、茱蒂、蓓塔等女性親友，以及歌蒂、涅蒂兩位賦予她重大影響的好友身上，追求女性認同與母親替代者，並期望能夠藉此修補發展過程中，與母親因區隔不明與個人化過程不完全所導致的缺憾與傷痛。如此的艱辛過程，最後終於可以在涅蒂母女的親密連結上，讓她得以窺見並體現她所渴望得到的補償。但是，莉莉正如

同她名字所代表的——「面臨潮水不斷衝擊」並且「被連根拔起的」百合——一樣，在她不斷掙扎奮鬥的求生過程中，終究難逃死亡的悲慘結局。²³ 莉莉在遍尋婚姻對象而不可得時——謝爾敦給過她兩次機會，羅斯戴爾提供她幾次交換條件——終於選擇「向下投入」；經過兩個失眠夜晚的折騰之後，莉莉吞服了過量的安眠藥而身亡。在《歡樂之家》文本中，莉莉的死，正好印證了修瓦特的理論：處於兩種不同時期女性小說轉接點上的文本，因為小說家會不斷地去思索該如何突破既定的一些侷限（承先），與嘗試為女性角色尋找適用的故事（啓後），因此，通常會以悲劇作為結局（135）。莉莉在服用過量的安眠藥致死前，腦中隱約浮現出自己懷抱著涅槃幼兒的景象：「她感受到幼兒的頭抵著她的肩膀，她無法理解幼兒如何來到這裏的，然而，她卻一點也不驚訝，只微微覺得內心充滿了溫馨與喜悅」（*HM*, 343）。在這死亡之前的一幕裡，莉莉與幾位女性朋友之間情誼，似乎又再一次地迫使她去思索早期與母親之間未解的衝突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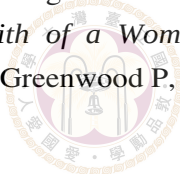
同時，根據芙蕾司的看法，女性彼此之間的情誼，由於是衍生自早期的母女關係，因此也凸顯出它對成熟女性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因為經由同性情誼的培養與照護，女性得以再一次體驗到與母親在共生式依戀時所帶給她的連結（bonding）與幸福感（euphoria）。然而，也正因如此之故，同性情誼在喚起女性的幸福感之際，卻不可避免地易使女性陷入幼時因為渴望脫離母親與尋求獨立，害怕被無所不能的母親吞噬的負面情緒之中。因此，女性在其早期發展時與母親之間關係所產生的矛盾與兩難，

²³ 有關莉莉在小說結尾的死，評論家有許多不同的解讀。Elaine Showalter 認為莉莉的死，正可以為女性結盟帶來一種新的視界，在這樣的視界裡，歌蒂與涅槃將會堅強與滿懷希望地繼續奮鬥下去（145）。而 Elizabeth Ammons 則認為莉莉死前腦中所浮現的景象——上層社會的淑女手中抱著勞動階級女性所生的幼兒——代表了「新女性」的前途將一片大好（42-43）。資料庫

同時也將成爲日後與其他同性交往時避免不了的矛盾與兩難：女性若是「與母親作過度認同」與極度渴求母親的呵護，「將很有可能會遮蓋了她內心深處對母親，甚至對其他所有女性的憤怒之情」（Flax 186）。沃頓筆下的莉莉・巴特，受到了既定的社會、經濟與慾力產物等固定狀態的束縛與侷限，無力做出任何改變，同時，她在遭逢母愛匱乏和與母親區隔不明／個人化不完全的情況下，隨後又面對幾位同性友人無法提供她所需的認同與替代者的挫敗，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莉莉在臨死之前腦中所浮現的母女相擁景象，以及這幅景象所帶給她的「溫馨與喜悅」等幸福感，恐怕也只能是極爲短暫的吧。

引用書目

- Abel, Elizabeth. "(E)Merging Identities: The Dynamics of Female Friendship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by Women." *Signs* 6.3 (1981): 413-35.
- Ammons, Elizabeth. *Edith Wharton's Argument with America*.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80.
- Auchincloss, Louis. "Edith Wharton and Her New Yorks." *Edith Wharto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2.
- Baym, Nina. *Woman's Fiction: A Guide to Novels by and about Women in America, 1820-1870*. Ithaca: Cornell UP, 1978.
- Buell, Lawrence. "Downwardly Mobile for Conscience's Sake: Voluntary Simplicity from Thoreau to Lily Bart."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17.4 (2005): 653-65.
- Boydston, Jeanne. "Grave Endearing Traditions: Edith Wharton and the Domestic Novel." *Faith of a Woman Writer*. Ed. Alice Kessler Harris. New York: Greenwood P, 1988.



- Chodorow, Nancy.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78.
- Cott, Nancy F. *The Bonds of Womanhood*. New Haven: Yale UP, 1977.
- Dimock, Wai-Chee. "Debasing Exchange: Edith Wharton's *The House of Mirth*." *The House of Mirth*. Ed. Shari Benstock. New York: St. Martin's, 1994. 375-90.
- Donovan, Josephine. *New England Local Color Literature: A Woman's Tradition*. New York: 1983.
- Erenberg, Lewis. *Stepping Out: New York Nightlif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890-1930*. Westport: Greenwood, 1981.
- Faderman, Lillian. *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New York: Perennial, 1981.
- Fetterley, Judith. "'The Temptation to be a Beautiful Object': Double Standard and Double Bind in *The House of Mirth*."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5 (1977): 199-211.
- Flax, Jane. "The Conflict between Nurturance and Autonomy in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and within Feminism." *Feminist Studies* 4.2 (1978): 171-89.
- Freud, Sigmund. "Femininity."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SE.) Trans. James Strachey. Vol. 22.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112-35.
- . "Female Sexuality." rpt. in *Women and Analysis*. Ed. Jean Strouse. New York: Grossman Publishers, 1974.
- Goldsmith, Meredith. "The Year of the Rose: Jewish Masculinity in *The House of Mirth*." *Modern Fiction Studies* 51.2 (Summer 2005): 374-92.



- Goodman, Susan. "The Context of Women's Relationships." *Edith Wharton's Women: Friends and Rivals*. Hanover & London: UP of New England, 1990. 48-66.
- Lidoff, Joan. "Another Sleeping Beauty: Narcissism in *The House of Mirth*." *American Quarterly* 32.5 (Winter 1980): 519-39.
- Lindberg, Gary. *Edith Wharton and the Novel of Manners*. Charlottesville: UP of Virginia, 1975.
- Malcolm, Janet.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6 November, 1986. 11.
- McCullough, Kate. "The Boston Marriage as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Queerly Regional Sexuality in *Diana Victrix*." *American Literature* 69.1 (March 1997): 67-103.
- Moore, Lisa. "'Something More Tender Still Than Friendship': Romantic Friendship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Feminist Studies* 18.3 (1992): 499-520.
- Rosk, Nancy von. "Spectacular Homes and Pastoral Theaters: Gender, Urbanity and Domesticity in *The House of Mirth*." *Studies in the Novel* 33.3 (Fall 2001): 322-351.
- Schiller-Chambers, Virginia L. *Liberty, A Better Husband: Single Women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P, 1984.
- Sedgwick, Eve.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5.
- Showalter, Elaine. "The Death of the Lady (Novelist): Wharton's *House of Mirth*." *Representations* 9 (Winter 1985): 133-49.
- Smith-Rosenberg, Carroll. "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1 (Autumn 1975): 1-29.
- .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omen's History: A Symposium." *Feminist Studies* 6 (1980): 52-78.



- .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P, 1985.
- Sullivan, Ellie Ragland. “The Daughter’s Dilemm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and Edith Wharton’s *The House of Mirth*.” *The House of Mirth*. Ed. Shari Benstock. New York: St. Martin’s, 1994. 464-81.
- Taylor, William R., Christopher Lasch. “Two ‘Kindred Spirits’: Sorority and Family in New England, 1839-1846.” *New England Quarterly* 36.1 (March 1963): 23-41.
- Vicinus, Martha. “‘They Wonder to Which Sex I Belong’: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Modern Lesbian Identity.” *Feminist Studies* (Fall 1992): 471-83.
- Wharton, Edith. *The House of Mirth*. New York: Signet Classic, 1964. 1905.
- . *The House of Mirth: Complete, Authoritative Text with B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Critical History, and Essays from Five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 Shari Benstock. New York: St. Martin’s, 1994.
- . *A Backward Glance, Novellas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33. 767-1069.
- Winnicott, D. W. *Playing and Reality*. New York: Tavistock/Routledge, 1971, rpd. 1991.
- Woodward, Carolyn. “‘My Heart So Wrapt’: Lesbian Disrup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Fiction.” *Signs* 18.4 (Summer 1993): 838-65.
- Yeazell, Ruth B. “The Conspicuous Wasting of Lily Bart.” *ELH* 59 (1992): 713-34.

